

蜀王蚕丛考辨

刘道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So-called “triple evidence”, they is to say to use ancient character research to verify ancient works research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Character of Bashu, is the third evidence to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Bashu. This thesis mainly research the meaning of Cancong that is the first king of ancient Shu. Books say that Cancong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ilkworm, but it doesn't agree with archeology detections. The triple evidence shows that it has relation with the totem toad adoration.

Keywords: Bashu Character Kings of Ancient Shu Cancong

内容提要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运用文献、考古与古文字研究三方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巴蜀文字,就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重点考证了第一代蜀王蚕丛的含义。认为古蜀先民得名于“蚕”,故曰“蚕丛”,与考古发现不符。应用三重证据法考证的结果显示其与“蟾蜍”有关。应是“蟾丛”,而不是“蚕丛”。

关键词 巴蜀文字 古蜀王 蚕丛

中图分类号 K892.4

文献标识码 A

一 传统的观点

1. 蜀与蚕

“蜀”的名称,来源很早,最初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字象虫形。《说文》:“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朱逊先据此认为“蜀”就是蚕^[1]。为孙次舟先生所驳。童恩正先生则认为“蜀”乃象形似蚕的毒虫,至于商代的统治者用一种代表毒虫的字来称呼古代的蜀人,则可能是一种贱称^[2]。

其实在中国古代,蚕与蜀不但是有区别的,而且经常被作为相互对立的比喻。《韩非子·说林下》:“鱓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3]《淮南子·说林训》:“今鱓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高诱注:“人爱鱓与蚕,畏蛇与蠋。”^[4]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二者是绝不能混淆的。在甲骨文中,除了蜀字以外,另有蚕字,似蚕形,与蜀字迥然不同。

任乃强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蜀字,原造字时,

象虫形,所指为野蚕。野蚕与家蚕全同,但形体较小,两额有黑斑一对,似眼。故造字时特夸大其目,以与其它蠕虫字区别。或曰象蚕吐丝之形。上四,即古蚕字,象其环节,亦通。要其字为野蚕^[5]。

2. 蜀山氏与蚕丛氏

朱逊先先生认为“蜀”就是蚕,甚至与蜀古代传说中的帝王蚕丛联系起来,以为蜀国的得名就是由于最初养蚕的缘故。孙次舟先生则认为,蜀地史前无蚕业,不能用图腾来解释,蜀乃中原译音,古蜀国实为夷族之邦,南迁后为叟,与今之彝族有关^[6]。

童恩正先生亦认为蜀的得名与蚕无关,而传说中的帝王蚕丛也不一定就是养蚕的倡导者,但是蜀确实是我国养蚕最早的地区之一。邓少琴先生则认为,巴蜀两国在古代均以虫命名,其字从虫。巴为蛇,而蜀为蚕,各以之作为图腾,成为两个部族。以名其地、称其人。此为巴蜀得名的由来。并指出“蠋为野蚕,经蚕丛氏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

代蜀人一大发明,故以蚕丛氏称之。^[17]

任乃强先生则根据生物进化理论,认为蜀与蚕是显然的两个阶段,时间性是不可混淆的。蜀是象形兼会意字,其产生应距原始字时代不远。蚕是谐音兼会意字,笔画用得很多,按文字发展的规律说应该比蜀字的产生晚。两者相距的时间,也就是人们改变称呼的时间(称呼野蚕与家蚕不同的时间),可能有几百年以至一千多年。是故,只就蜀山氏与蚕丛氏的称呼来说,他们就是显然不同的两个时代。

二 蜀、蚕丛与蟾丛

1. 蜀、蚕与蟾

实际上,无论认为蜀与蚕无关,还是坚持蜀进化为蚕。二说都仅仅是依靠中原文献推测的,既无见于巴蜀古史传说,也与考古发现相去甚远,更不见于出土的巴蜀文字中。众所周知,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从史学中分离出来,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尤其是研究史前史,考古学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出土的考古资料并不能证明蜀山氏或蚕丛氏与蚕有关。无论是实物、图像,还是符号都不曾出现。这对于重视精神信仰的古蜀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退一步说,如果养蚕是真实的话,那么即使精神生活中不需要,但是作为当时生产活动和生活中最重要内容的养蚕活动,是不可能不留下一些遗迹的。然而它就是没有留下任何与蚕有关的蛛丝马迹。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相对于蜀与蚕来说,与古蜀国后面的鱼凫、杜宇、鳖灵等几代蜀王有关的鱼、鸟、鳖等考古资料却屡见不鲜,令人叹为观止。这就形成鲜明的对比。甚至在出土的巴蜀文字中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目前古蜀国考古发现中出土物最丰富的两大遗址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在这两大遗址出土的考古资料中,有很多动物的造型和塑像^[18],如鱼、鸟、虎、蛇、龙等动物,甚至包括人、人头、手等,几乎都可以在出土的巴蜀文字中被发现,就只有蟾蜍是唯一的例外。当然其中的猪和狗也没有出现在巴蜀文字中。但是蟾蜍与猪、狗不同,因为蟾蜍是与鱼、鸟、虎、蛇、龙等动物一样,都与古蜀人的精神生活有关,是其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甚至包括现实生活。蟾也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说,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资料可以提供证明,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只是陶蟾蜍和石蟾蜍,到了金沙遗址中,就成了金蟾蜍,与金杖和金冠带^[19]中的鱼和鸟身价一样,同样身份显赫,尊贵无比。它表面上的排列整齐的凸

点,表明它们只是蟾蜍,而不是青蛙。实际上,很多出土的巴蜀器物上有关“点”的造型、图案或符号,无论是一点、几点、甚至是一排或一列的点,它们都代表了蟾蜍,这是因为不仅蟾蜍身体表面布满了凸点(俗称疙瘩),而且它的又一变体是蝌蚪,也是点状,且有个小尾巴。所以这两点合在一起,那就成了蟾蜍的独家代表了。因此,如果说要用图像或者符号来表示蟾蜍的话,那么这个蝌蚪状的图像或符号,就是巴蜀文字,表示蟾蜍,应释为“蟾”。既然其中的鱼、鸟、鳖与古蜀王有关,而蛇、虎则与巴王有关,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那么具有同样地位的蟾呢?

另外一个现象也非常值得注意,中原甲骨文中的“蜀”字,与巴蜀文字中的这个“蟾”字非常相似,简直就是一模一样,都是大头带个小尾巴。而《华阳国志》、《韩非子》和《淮南子》等文献则记载蜀与蚕形似。

2. 蚕丛与蟾丛

无论是古蜀人鱼凫氏,还是蒲卑氏、开明氏,都与巴蜀文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与他们有关的文字。或者说这些文字都与鱼凫、杜宇以及鳖灵本人或部族或国家有关,已经有许多学者作了论证。

巴蜀文字中常见的“手”的象形符号^[10],它既可以表示手这个名词,这是它的本义,也可以表达与手有关的,如“举、打、握、护、推、拉、拖”等动作,至于引申出来的意义,那就更多了。但是,如果手臂是呈直角的话,那就说明手臂是立起来的,即手是举起来的,因此,它的本义就只有“举”、“捧”或“丛”等含义了,这些动作也只能用手来进行。这里的“举”和“捧”,实际上表达的就是“奉”和“献”的意思,即“奉献”。而蚕丛的“丛”字,其本义就是“聚集”,这里又有“奉献”之义。考古发现也提供了证据,如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中出土的青铜人像的双手的造型就是“举”和“捧”,甚至是“丛”的动作,表达的就是“奉献”之义。

而在巴蜀文字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蝌蚪状的“蟾”字,它们或单个地与手组合(图一);或两个并列出现;更多地是与“手”状符号组合^[11]。总之,表达的都是相同的信息:动作——聚集;名称——蟾。即“丛蟾”,因“蜀左言”,故为“蟾丛”。因为“丛”的本义就是“聚”,而聚的动作只能是用手来完成,是不可能用身体的其它部位来完成的,尤其是象蝌蚪这类的东西,所以手和蝌蚪的组合可以表示“丛蟾”这个概念和动作。而两个或更多的“蝌蚪”



图一// 蝌蚪状“蟾”字与手组合

组合在一起,所表达的就是“蟾丛”这个概念和动作了。因为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只有用“多”这个概念才能表达“丛”的含义,毕竟越“聚”越“多”吗!至于那些呈“双手捧‘蝌蚪’”的组合,已经很直观地表达了“丛蟾”这一概念与动作。之所以表达同一个概念,要分这么几种组合方式,这是由这些文字的载体决定的。以兵器为载体的文字,因其面积足够大,所以会以手的图像方式出现,而以印章为载体的文字组合,由于其面积太小,当然是越简略越好。因此,会以曲折符号代替手的图像或者干脆连这样的曲折符号都省掉了,直接用两个或几个“蝌蚪”来表示。前者多在兵器上,而后者则多在印章上^[12]。因此,与其说是“蚕丛氏”,则不如说是“蟾丛氏”,后者似乎更合适。

第二,在所有的巴蜀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成都三洞桥出土的战国铜勺上的 5 个字(图二)。铜勺的勺面饰有“龟、鸟、鱼及另外两种图像”,这 5 个图像中的龟、鸟、鱼分别与古蜀王鱼凫、杜宇以及鳖灵有关,此说已经先后被孙华先生、吴怡先生、冯广宏先生等诸君所论证,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但是,其中的另外两种图像却争论颇大,且由于证据不足,从而认同者不多。

其实,从这 5 种图像的位置顺序、大小比例、方位、笔法和笔划的规律中,可以看出,这些并不只是为了美观,而是严格遵循一定的规律,是不允许个人任意发挥或者随心所欲地去创造的。



图二// 战国铜勺上的巴蜀文字

说明它并不只是艺术那么简单。仔细观察的话,可以总结其规律如下。

1. 位置和顺序:龟的位置居中且图像最大,鸟的位置居于龟的左侧上方,而鱼在龟的右两侧上方,另外两种图像中的“螺”图像(或曰“S”文)与“蝌蚪”(或曰“心”文)图像则分别在龟的左右两侧,螺在左侧鸟的下方,而蝌蚪则在右侧鱼的下方。因“蜀左言”所以其顺序是:龟——鸟——鱼——螺——蝌蚪。

2. 大小比例:这 5 个图像的大小比例,按照由大到小的顺序也是:龟——鸟——鱼——螺——蝌蚪,其中处在中心位置的龟的图像最大,其次是鸟,再次是鱼,另外尤以“蝌蚪”为最小。这五种图像大小的比例与它们所代表的实物并不相符合。

3. 方位:这 5 种图像中所刻画的 5 种动物的头部都一致地朝向同一个方向。

4. 笔划和笔法:笔法的由细到疏和笔划的由繁到简的顺序也是龟——鸟——鱼——螺——蝌蚪。

总之,这 5 种图像之所以遵循这种规律,而且其大小比例也与它们所代表的实物并不相符合,就说明它们体现的并非是实际比例,而是与它们所代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与事物的地位、重要性及影响力有关。它们完全符合近大远小的视觉效果和详今略古的记事原则。因此,它们如果是代表五代蜀王的话,则非常合理。

据孙华先生考证,其中的龟、鸟、鱼分别代表了古蜀人开明氏、蒲卑氏、鱼凫氏,它们是古蜀人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的产物^[13]。吴怡先生

认为它们与蜀人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有关系^[14]。冯广宏先生则提出“这似乎是开明时期精简扼要的标准史记”。认为其中的鱼、鸟、龟分别代表了鱼凫、杜宇和鳖灵这三代蜀王。并指出《蜀王本纪》记述的 5 个古蜀王朝,这里出现了 3 个,主要是离开明最近的三代,表明这是存在于文物上最简单的史迹记录,初步证实了《蜀王本纪》中所述蜀王名号之不虚。

至于另外两种较小的图像螺和蝌蚪,争论和分歧最大,对于前者,有的释为蚕;有的释为蛇;

而后者,有的被释为蛇,有的释其为鱼头蛇尾,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不表示动物,仅仅只是文字,有的释其为“祖、神”^[15];有的释其为“万岁”^[16]。

笔者以为不然,因为如果2个最小的图像并不表示动物的话,这与前面的与鱼、鸟、鳖3个动物,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就割裂了前文所总结的整体性、一致性和协调性。更加违背了上文所总结的规律,与其实所遵循的规律相矛盾。所以本人认为这两个图像不能只简单地理解为文字。这既要受到其内在的规律所制约,更由其本质所决定。前文已经论述了所谓的“蝌蚪”就是“蟾”或“蟾丛”,这里它最小又居于末尾,这与它作为第一代蜀王的身份是完全符合,因此,它所代表的就是“蟾丛氏”,也就是文献中的“蚕丛氏”。蝌蚪代表蟾蜍,又代表蚕丛氏,这也与蚕丛氏的图腾是蟾蜍崇拜相符合。因为它去原始社会不远,所以保留的原始宗教遗迹也最多。

3. 蟾丛与蟾崇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首先,究竟什么是“目纵”?历来虽有不同的猜测,但它一直是个谜。直到三星堆遗址二号坑的发掘,终于出现了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契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3件A型青铜人面像就与之相对应,这3件纵目的A型青铜人面像,“(人面像)A型3件。眼球都明显突出眼眶。标本K2②:148,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厘米,凸出眼眶16.5厘米。大嘴,两嘴角上翘接近耳根。双耳极大。”^[17]另外1件圆柱状眼球突出眼眶9厘米。它们究竟象征什么,学术界对此已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多数学者认为它们与“目纵的蜀侯蚕丛”有关。

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根本不可能存在过像青铜人面像那样纵目的人类。因此,经过神化和极度夸张,那是一定的了。盖因其作为第一代蜀王,刚刚进入文明时代,或者是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其离原始社会毕竟不远。受以图腾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影响必然最大,遗留也必然最多。因此,也可以说,第一代蜀王也必然与宗教崇拜有关。也就是与蟾蜍崇拜有着直接关系。这在文献之中是有记载的,除去夸张的成分,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与目纵最接近的就是青蛙与蟾蜍了,只有它们的眼球是完全突出在眼眶之外的,基本符合“纵目”的条件。而蛙、蟾崇拜在原始社会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三星堆出土的石蟾蜍以及金沙出土的蟾形金

箔^[18]等考古材料,则反映了蜀人崇拜蟾蜍习俗的延续,也是蜀人崇拜蟾蜍的最直接考古证明。也证明了蜀人只崇拜蟾蜍,而不是青蛙。因此,报告称金沙遗址出土的蟾形金箔为“蛙形金饰”,是不太确切的,因为蛙身体表面是没有疙瘩的。如果对比图腾崇拜的对象,就会发现不仅人面像的纵目形象与蟾蜍突出的眼睛非常接近,且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的青铜人像、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像、青铜面具,它们的口大多与蟾蜍的口非常相似,极扁且阔^[19]。

蜀王与蜀先民蚕丛氏以及蟾蜍崇拜反映在出土的巴蜀文字中,都只是这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蝌蚪”符号了,前文已释为“蟾丛”。这些已释为“蟾丛”的“蝌蚪”符号,几乎都离不开手的组合,有的甚至就在双手的中间位置,它们所反映的正是古蜀人的蟾蜍崇拜,用蝌蚪来代表蟾蜍。而巴蜀文字往往又与图腾崇拜^[20]和宗教祭祀密不可分。因此这些蝌蚪图案当然也不例外,代表了崇拜蟾蜍的古蜀人蚕丛氏。即引申为“崇蟾”或“蟾崇”。

有一个现象很容易为学者所疏忽,那就是在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地的考古发现中,把两地的出土物整理归类以后,就会发现在所有的与动物有关的雕塑、造型、图像等考古资料中按照材质来分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铜器、金器等^[21],虽然两地出土的有关的动物种类很多,但是,能够让这四种材质齐备的动物却少之又少,除了鱼、鸟之外,就只有蟾蜍具有这种待遇了,这只是其一。其二,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中还只能发现鱼和鸟两种动物的形象,而在金沙遗址中就有了鱼、鸟和蟾蜍这3种动物的形象,当然了,两地都出土了金面具和人头像。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文化中的蜀人是把“鱼、鸟、人”三者上升到了同一个高度,无论现在的学者怎么看待它们,视为图腾、族徽?还是蜀王、祖先?甚至是日神、天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几乎可以认定,它们在当时的蜀人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这就足够了。同样道理,金沙遗址时期的蜀人只不过在这三者之外,又增加了蟾蜍。也就是说他们四者的地位也应该是一样的。反过来说,为什么出土那么多金器中,除了鱼和鸟两种动物之外,还有蟾蜍呢?鱼和鸟还是可以理解的,学者多认为他们分别与鱼鳃和杜宇有关,那么蟾蜍呢?它又与什么有关?其三,频繁地“出现”在这两大遗址中的蟾蜍,为什么在巴蜀文字之中几乎销声匿迹了呢?相对来说,鱼和鸟却仍然是巴蜀文字的主题呢?而比鱼和鸟更多地出现在巴蜀文字中的当然是“蝌蚪”了。也就是说三者在巴

蜀文字中的地位也几乎是等同的。如果说鱼和鸟与蜀王鱼凫和杜宇或者说与他们的部族有关,那么蝌蚪又与什么有关?不能不令人相信这些蝌蚪就是蟾蜍,实际上,蝌蚪也就是蟾蜍。并且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字所体现的时代是不同的,又正好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在这三个时间段中,鱼和鸟的造型在三星堆和金沙时期是处于鼎盛时期,而在巴蜀文字鼎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衰落。然而蟾蜍却与之不同,在三星堆中它只能够由普通的材质所体现,但在金沙中它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而在后来的巴蜀文字时期,超越了鱼和鸟,并且遥遥领先于其他事物的却是蝌蚪。按照前文分析所得出的规律,蟾蜍是处于上升期的,但是,即使它已经衰落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一下子就突然销声匿迹了的。更何况蟾蜍和蝌蚪这两者中,一个神奇的彻底消失,另一个却又突然大量出现,并且二者又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它们实际上就是一分为二,却又合而为一。

另外,可能也与蟾蜍崇拜有关,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陶、石、金“蟾蜍”等就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这也符合原始宗教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最初的宗教是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主要是对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注意到的第一个天象应该是日夜交替,太阳和月亮就成为古人首先崇拜的对象,因此,世界各地普遍崇拜日神和月神^[22]。不仅有“羲和生十日”的神话,也有“常羲生月”和“嫦娥奔月”等神话传说。《山海经》记载:“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23]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就集中体现了古蜀人崇拜日、月的习俗。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陶、石、金蟾蜍等可能与古蜀人崇拜月亮的习俗有关。因为蟾蜍的生活习性都是昼伏夜出,古蜀人很容易把月亮与蟾蜍联想到一块,成为月中的神物。

《初学记》卷一引《淮南子》:“羿请不死之药”^[24]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25]不仅“常羲生月”和“嫦娥奔月”等神话传说流传很广。用“蟾蜍”代表月亮的习俗也很流行,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屡有反映,成语“蟾宫折桂”也常被引用。《淮南子》:“日中有踞乌,而月中有蟾蜍。”^[26]古蜀地区的许多考古发现,都反映了古蜀人有崇拜月亮和蟾蜍的习俗。宗教崇拜在母系氏族以后由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抽象为图腾崇拜,图腾作为族徽和氏族的标志,还被看作氏族的祖先和氏族的保护神。“图腾”一语源于印

第安人的土语“totem”,意思是“他的亲族”^[27]。关于图腾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比较多的。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氏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28]这里所谓的云、火、水、龙、鸟都是当时氏族的图腾。《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就是商氏族的图腾。另外姓的由来也能看出图腾形迹,如姜姓以羊为图腾,凤姓即凤。因此,古蜀时期蜀王的名称,也反映了古蜀人的图腾崇拜。无论是蜀王鱼凫,还是望帝杜宇,都是古蜀人鸟图腾崇拜这一特征的体现,因为有望帝死后化为子规,蜀人闻子规啼而思望帝的传说,而鱼凫也是一种鸟。而最早的蚕丛氏却是以蟾蜍为图腾进行崇拜。

三 原因和结果

1. 时代背景

成都平原上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青羊宫文化等考古发现,证明古史传说中蜀王蚕丛至开明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结合文献以及考古材料分析,距今4500~3700年的宝墩文化^[29]就属于蜀王蚕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文化中期,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过渡时期。由于蜀王蚕丛还属于石器时代,崇石祭山正是石器时代的特征。“死,作石棺槨”也就是崇石这一习俗的反映^[30]。而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蟾蜍、石蛇、石虎、石人像、石璋等大量石器^[31]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是新石器时代特征的延续。以及蜀中的石笋、石镜等大石文化也源于此。而祭祀山川则许多文献都有记载,如《尚书·尧典》:“望秩于群山……肇有十二州,封十有二山。”^[32]尤其是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边璋,其上遍刻的图案,更是古蜀人祭祀礼仪的反映,其中一组图案应是插璋祭山与《周礼·春官·典瑞》中记载的“璋邸射以祀山川”相印证^[33]。首先,为数不多的文献资料为我们简单勾勒出蜀王蚕丛氏生活的时代背景与生活画面:“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槨”、“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神化不死,其民亦往往随王化去。”其次,作为主流文化的原始宗教,已经由月亮、月神等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发展为蟾蜍等图腾崇拜。蜀地有关蟾蜍的图腾崇拜出现的时间虽然不是最早,但是影响却最大,“蟾蜍”可能就是蜀王蚕丛的图腾。

2. 语言和习惯

既然“蚕丛”就是“蟾丛”，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蚕丛？又是怎样演变的呢？首先是因为时间久远之故。由于先秦蜀地缺少文献，《蜀王本纪》、《蜀论》、《华阳国志》等有关文献都是秦以后的作者根据古史及神话传说整理而成。不仅对于早期蜀王的事迹，文献有不同的记载，甚至历代蜀王的名称也有很大不同。它们或字形相似，如柏灌、柏灌与伯雍，鱼凫、鱼易与鱼尾等；或语音接近，如鳖灵、鳖令与鳖冷等；而“杜宇”的别号有“蒲卑”、“蒲俾”、“蒲泽”等不同说法，则是既有音近，也有形似的原因。即使是最晚的开明的文献记载的差异都如此之大，既有“丛帝”和“奇帝”之异，更有“鳖灵、鳖令与鳖冷”之别。然而文献却仅仅对于最早的蜀王蚕丛的记载完全一样，不能不令人惊疑。按理说，对于第一代蜀王蚕丛的记载则应该是最不可靠的。那么为什么作为最早的蜀王就一定是“蚕丛”，而不是“蟾丛”、“蟾崇”或者别的什么形似或音近的文字呢？

其次是受方言与谐音的影响。巴蜀地区虽然有巴蜀古文字，但是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使用的范围也不是很大，因此在秦统一文字后，逐渐绝迹。虽然有大量出土，也因其断层，而变得难以释读。因此古史传说，在这种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演变。一定会发生转音或讹传的现象。四川话中蚕丛、蟾丛与蟾崇差别不大。因此，那些只能靠口耳相传的古史和神话传说，后来被迫记时，巴蜀文字记录下来就是“蟾丛”，而中原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蚕丛”。而中原文字与巴蜀文字本就不同，何况时间又是那么久远呢？

再次是由于后世蜀地发达的丝织业的影响，很容易使人们把它与蚕联系在一起，从而掩盖了历史真相。虽然成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丝织业的中心，但是蜀地的丝织业，发达得还是较晚，已经是秦灭巴蜀以后的事了。而《蜀王本纪》、《风俗通义》、《华阳国志》等有关文献则正是秦以后的作者根据古史及神话传说整理而成。因此受其影响颇大。另外，也与古人对于蜀的误解分不开。当然也与文人的宣扬有关，文人对于蚕要比蟾感兴趣得多。无论是把“蜀”释读为蚕，还是毒虫，也无论是汉代的司马迁、杨雄，还是晋代的常璩，则都是秦灭巴蜀以后，也在蜀地成为丝织业中心以后，因此，潜意识里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把“蜀”理解为与蚕有关的事物。然而甲骨文中“蜀”和“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 [1]朱逊先：《古蜀国为蚕国说》，《时事新报·学灯》1939年第14期。
- [2][20]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 [3]韩非：《韩非子》，中华书局1954年。
- [4][26]刘安：《淮南子》，中华书局1954年。
- [5]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 [6]孙次舟：《古蜀国的起源》，《皇朝评论》1941年第22、23页。
- [7]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 [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0]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五），《文史杂志》2004年第5期。
- [11]高文、高成刚：《巴蜀铜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
- [12]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二），《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
- [13]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第1期。
- [14]吴怡：《试析巴蜀青铜器上的鸟、鱼、龟、虫（蚕）纹饰》，《四川文物》1989年第5期。
- [15]白剑：《三星堆金杖“鱼鸟图”——华夏古老神奇的“鲲鹏之变”》，《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 [16]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八），《文史杂志》2005年第2期。
- [17][3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 [18]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2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
- [1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21][3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陶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
- [22]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2页。
- [2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24]《本草纲目》载：‘疗发背疔疮，一切恶肿。’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华书局1982年。
- [25]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79年。
- [27]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2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
- [29][30]段渝：《伍叁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346页。
- [32]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